

从崔浩之祸看北魏前期的汉化改革问题

文 / 方志龙，路虹

崔浩（381-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南北朝时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南北朝时期汉族世家大族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作为北魏三朝元老，他多次在关键时刻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对北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却因成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国记》，被尽诛全族。在其临刑前，“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崔浩死后，“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史以下尽死”。于是乎，有人认为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是《国记》事件。关于崔浩的死因在史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郗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罪，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

按史书的记载，崔浩受命编写《国记》，对鲜卑的源起毫不避讳，“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并未对北魏前期的旧事屈笔回护，因此，引起了统治阶层的不满而获罪得诛。

然而，考察《魏书》其它篇目的记载不难看出崔浩的真正死因不止于此。

“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术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祈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允竟得免。”

在《魏书》高允传中记载了世祖拓跋焘欲追究国史案的主要涉案者高允之罪，时高允亦亲口承认在编撰国史方面自



己所承担的责任多于崔浩，然而在恭宗拓跋焘的极力开脱之下，高允竟得特赦。世祖与恭宗对国史案两名主犯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窥见，国史案是令崔浩获罪的直接原因。

一、新兴政权稳固统治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动荡局面，北方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汉族世家南迁，而留下的汉人大多筑堡自保，形成了凝聚力极强的地方势力。鲜卑乘势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然而人口、文化、经济皆缺乏优势的游牧民族，对于北方广大地区的掌控力较弱。

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北魏建国之初，便开始积极笼络汉族世家大族。为了维系与世家大族的关系，鲜卑统治者选择主动接受发展更为充分的汉文化，从而缓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于是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便逐渐将汉族士大夫纳入统治阶层，《魏书》有记“（皇始元年九月）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北魏开国之初吸纳了大量有才能的汉族士人，崔玄伯和王宪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崔玄伯，出自清河崔氏，拓跋珪久闻其名。王宪，苻坚名相王猛之孙，后主动投魏，深得道武帝

赏识。对于任用汉族士大夫为臣，北魏统治者还是颇有远见的。汉族士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有成熟的治国理政经验，这对于初建的北魏政权是极为重要的；其时，给北魏带来巨大威胁的后燕、南燕、后秦等政权也在积极网罗汉族士人，北魏统治者自然不甘其后。

这些汉族士人在加入北魏后，为稳固鲜卑在北方的统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崔玄伯入魏后拓跋珪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与张袞合掌机要，创立制度。《魏书》有载“（拓跋珪）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袞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此后拓跋珪思量国号时也采纳崔玄伯的建议，称为“魏”。由此可见，拓跋珪对于汉族士人加以重用，甚至愿意在重要的决策上听取汉族士人的建议。

崔玄伯长子崔浩，出身名门，智谋过人，才华出众，自比子房。太武帝听取崔浩之计，在破赫连夏、征讨柔然、攻灭北凉等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解除了强敌对北魏的威胁。据文献记载崔浩尤善“玄象阴阳”，多次为皇帝预言卜算，皆应验如是。由此可见，崔浩不仅对天文星象颇有研究，且洞察人心世事，擅长借天象谏君主，是一位才气过人的谋士，为稳定北魏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太武帝在重用崔浩的同时，对其忠诚仍心存疑虑。《魏书·王慧龙传》中记载崔浩因称赞王慧龙“真贵种也”，被司徒长孙嵩密告太武帝，称崔浩“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拓跋焘因此怒斥崔浩，后崔浩“免冠陈谢得释”。由此得见，鲜卑统治者虽然主动接受了汉文化，但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狭隘的意识局限性，成为北魏前期汉化改革的最大阻碍。

二、“大整流品，明辨氏族”激化阶级矛盾

北魏作为鲜卑建立的政权，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开始，就深知想要稳定统治必须向汉人学习。但对于作为统治阶层的鲜卑贵族来说，想要改变沿袭数辈的游牧生活并非易事。“大整流品，明辨氏族”的举措旨在提高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只有政治势力而无儒学修养的鲜卑贵族必将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改革注定会遭受重重阻碍。

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在他的强制推动下，北魏迁都平城、改革官制、移风易俗以及推广农业生产，这样的汉化改革措施被其后继拓跋嗣、拓跋焘承袭了下来。史载：“赖大汉之兴，改正朔，易服色，协音乐，制礼仪，正声古礼，粗欲周备。叹其薄德，无以易民视听。博士曹褒睹斯诏也，乃上疏求定诸仪，以为汉礼。”

在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下，汉化在稳步的发展，其在拓跋珪时期到达了一个小高峰，由于正处建国初期，拓跋珪便利

用其与后燕交战胜利不断积累的权威，渐渐的加强皇权与推进汉化，此时的鲜卑贵族正沉浸在屡战屡胜的喜悦之中，并未滋生强烈的反对情绪。

登国十年（395）拓跋珪在参合陂击败后燕，利用胜利的契机于皇始元年（396）“初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

拓跋珪在出征大胜之后大用汉族士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汉族士人的地位。这在鲜卑贵族看来是一个汉人“夺权”的行为。431年，北魏统治阶层又征调大量汉族名士在平城觐见。《魏书》卢玄传中这样记载道：“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氏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诘几人也？宜其三思。”

崔浩在有“齐整人伦，分明氏族”的想法之时，卢玄便劝他时机未到，应三思而行。然而崔浩执意施行，由此招致鲜卑贵族的仇视，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这既不利于其汉化政策的推行，更为他之后的祸端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鲜卑贵族对于先前拓跋珪大量任用汉人的措施有所微词，那崔浩“大整流品，明辨氏族”的行为则触动了鲜卑贵族最紧绷的神经。这一措施的实质是按照汉族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甄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抬高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已经触及了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对于鲜卑贵族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

由于崔浩的恃宠而骄，经道武帝、明元帝两代至太武帝，鲜卑贵族对崔浩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崔浩又与太子拓跋晃交恶。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



以胜济？”

太武帝征凉，命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推荐冀、定、相、幽、并这五州士人十多名，全部担任太守。拓跋晃对此表示反对但崔浩一意孤行仍按自己心意行事。这不但使鲜卑贵族内心更加不安，更加深了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鲜卑贵族与崔浩为首的汉族士人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深化，崔浩又一次因自己的自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三、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碰撞冲突

北魏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中原王朝的大动乱时代，而拓跋部也是十六国以来最晚进入中原大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其接受汉文化的程度相对较浅，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在融合交流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摩擦。北魏前期汉化改革由统治者倡导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较激进，直接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当矛盾逐渐加剧达到一定程度时，作为当权的鲜卑贵族为了维护自己自身利益，以强权进行阻挠，导致北魏汉化改革被迫中断。国史之狱是鲜卑贵族以强权抵抗先进汉文化的传播与渗透的集中体现，而冲突的升级恰恰说明汉文化已经对鲜卑旧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然而，鲜卑的汉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拓跋珪对于收继婚此等旧俗的回护便能很好的说明鲜卑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汉化。据史书载，拓跋珪的生母贺氏另有“少子”，“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少子拓跋觚在《魏书》中被记作拓跋翰之子，拓跋翰则为拓跋寔的同母弟。但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凭现有的史料只能推断出贺氏被人收继。贺氏生珪、仪、觚三子，其中仪和觚的生父难以确定，珪是否为献明帝寔的遗腹子也具有争议。

在魏书中对于收继婚并无过多的描写，其根本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认为这是一项难以启齿的陋习，不愿其被书写在史书中。这恰好反映北魏统治者在逐渐接受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世祖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浩复固争，不从。

在崔浩负责编修国史之前，拓跋珪便迫于压力多次驳回崔浩谏言。国史案爆发后，崔浩彻底沦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就连拓跋焘也无力维护这位三朝元老，一代名臣就此陨落，崔浩成了鲜卑贵族武力反抗汉化的最典型的牺牲品。

在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充分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期。北魏的汉化改革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案列，在改

革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改革在曲折中缓慢进行，虽然北魏前期的改革至恭宗时暂时中止，但最终影响到了孝文帝，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大力推行下，汉化改革施行得更加彻底：迁都洛阳，胡服汉化，改汉姓，促进两族通婚等一系列措施都向世人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崔浩虽死，但其施政期间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民族融合与北魏的政权稳固与社会进步。

四、结语

北魏前期的汉化历经道武帝、明元帝以及太武帝三朝的努力，北魏前期的汉化最终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过程中虽然牺牲了以崔浩为代表的部分汉族士人，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鲜卑族逐渐接受了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无论汉族还是鲜卑，都成为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魏收. 魏书·崔浩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李延寿. 北史·崔浩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4] 楼劲. 北魏开国史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5] 朱绍侯, 齐涛, 王育济. 中国古代史(上册)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 [6]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 赵心瑞. 北魏政治家崔浩死因再探 [D]. 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37-40,37-40.
- [8] 王朝峰. 交流与融合中的牺牲——浅谈崔浩之死 [D].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117-118,117-118.
- [9] 刘军. 论北魏宗室与汉族士人的文化交往 [J]. 历史教学问题, 2015(01):126-129+26.
- [10] 胡克森. 北魏的正统与汉化 [J]. 史林, 2015(05):38-53-220.
- [11] 李翠.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精彩篇章 [N]. 中国民族报, 2021-01-26(005).
- [12] 王朝峰. 交流与融合中的牺牲——浅谈崔浩之死 [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03):111-112.
- [13] 薛海波. 论北魏前期国家性质与胡汉豪族 [J]. 云冈研究, 2021,1(03):50-56.

【作者简介】

方志龙(2001—),男,汉族,甘肃静宁人,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历史系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路虹(1980—),女,满族,宁夏中卫人,学历:博士,职称:副教授,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师,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敦煌学、历史文献学。